

财阀集团与日本帝国主义

〔美〕 朱永德

自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即以“富国”、“强兵”为新政府的两大目标。“富国”的方式，不外是发展工商业、促进生产和贸易、建立有效的财经制度与政策。然而维新政府最独特的手法，乃是在培养一批企业组合，用各种保护优惠方式，使之在国际市场上有强大的竞争力。是故，明治以来政府与公司企业间，存有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政府按企业的需要，作各种适时的支援，偶尔也协调企业间的纠纷，或强行归并以增加实力。对那些与本国企业相争之国外对手，则尽力加以限制与阻挠。另一面，日本的企业会社，在国家有所需求时，随时可放下自身的直接利益，全力以赴，为国效劳，视国家之得失为自身的得失。在这种基本精神主导之下，近世日本财阀集团得以迅速发展，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举世无敌的地位。日本财团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从维新到甲午战争，历时20多年，可谓成型时期；第二，从马关条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约20年，是迅速扩张时期；第三，从世界大战到“九一八”，上下15年，是与政党合作的加速扩张时期；第四，从“九一八”到投降，亦约15年，是与军政府合作，与军国主义共存亡的时期。不论是在维新武士的扩张主义时期，或是政党当权的经济扩张主义时期，或是军方当政的军国主义扩张时期，财阀集团皆受惠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并且是日帝主要剥削榨取他国的工具。所以财团与日帝是二二为一，不可分割的共同体。

一 财阀集团的兴起

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已出现了工商业之发展，在京都、大阪、长崎和江户等城市产生了一批较大型的商号和企业组织。^① 他们与所在地的封建武士，保有相当密切的联系，相互间通婚联亲的亦间或有之。到了幕末时期，也有追随封建武士出资支持皇室复辟运动的。及至明治维新，继续用财力捐献、贷款、认购债券等不同方式来支持新政府。为了报偿这种支持，政府也让这些商号组织代政府向农民收税。当时税收皆以现款支付，而付款者只有食米。有些商号因此从速成了米商，并从兑换食米与现金间，颇有所获。其中特别受惠的如三井、小野等。到了1872年，政府兴建银行，以种种方便，使这批熟悉市场与金融业者进入银行业。受惠者除了三井、小野，尚有岛田、住友、鸿之池等。

维新政府成立未久，长洲、萨摩、土佐和肥前等处的封建诸侯在武士怂恿下，带头

^① Takeo Yazaki, *Social Change and the city in Japan*, Japan Publications, 1968. p. 305

将自己的封地归还天皇。皇室为了报偿这些诸侯，或任命为原居地之地方首长，或任命为新政府中之军政首长。新政府又向英国银行借得一笔贷款，对归还土地之诸侯，分别给以适当的现金补偿，故在明治时期，这批旧时的诸侯成了第二种腰缠现金的投资者。同时，这批旧时代的贵族有过管人和治理的经验，因而不少能以投入新型企业。

这批以武士背景而转为新型企业最成功的是土佐在长崎发展业务的岩崎弥太郎。在他领导下的一批武士组织了航运公司，日后成为日本第二大财团的三菱会社。以武士背景发展成企业的尚有安田、浅野等，都在武士集资支持下获得发展。三井虽是旧时代的大商号，并有银行业之经验，维新之后，参入一批新退休的武士，并将公司改组，因而与维新政府中之要员结上关系，自此步上成功之途，后来成为日本最大之财团。

武士中最杰出的当是涩泽荣一。他与安田、浅野同样有农村的背景，但在正式获得武士身份后，与皇室挂钩，并自染料事业上获利，继而为其封建领主在银行贸易上有所开展。由于其出众之才能，终于被新政府收罗至大藏省服务，得到维新领袖大隈重信和井上馨等的赏识。在1873年，涩泽组织了第一银行，出任总裁。又协助三井与小野双方银行业合并改组。日后又组织了日本最成功的棉纺业，涩泽一生创办了上百家的企业公司，为明治时期日本最成功和最有名望的实业家。

由上所述可见，日本新兴的企业界，不乏旧日的武士。故说日本近代之大企业家，不少是与维新政府的领导阶层同出一源，致使双方容易合作无间，是有相当依据的。可是近世日本财阀集团的形成，不能没有19世纪80年代政府对工厂私有化政策的推行。

由于维新后的各种建设，特别是对北海道的发展使得国库空虚，到1880年，维新政府面临空前的经济危机。斯时，松方正文出任大藏省，实行经济紧缩政策，又将政府所有非战略性的工厂，廉价售与私人经营。^①当时日本有资金和稍具管理经验的，非昔日的封建武士，即略有基础的企业会社，当时政府出售之公营企业，大多仅以原投资之半价出售。到了1883年和1884年，尚有不少未能出售之工厂，其时不少价格降到原价之1/5，半送半卖的成为私人企业。由于买价之低廉，大多公司短期内即得利润。

在这过程之中，住友购得全国最大的铜矿——别子铜山；浅野和之原得到其他矿场；深川得到缫丝工厂；古川得到水泥工厂；广岛群获得爱知纺绩；三井得到富冈纺织厂，又有三池煤矿。此外田中、山崎等等，也各有所获。

在这政府廉价转让过程中，最特殊的当是三菱所受到的优待。早在1874年日本远征台湾时，旧日幕府留下的长崎航运不克为政府运送军队，重任给了新建之三菱会社。在出征完成之后，新政府将公有之13条船只赏给三菱。次年，三菱进入国际航运业，政府遂每年津贴25万日元。到了1876年，政府为了平定萨摩之乱，又由三菱代为运兵。乱平后，政府又将另外9条公船赏给三菱。到了1885年，政府将其另有的航运公司与三菱合并，并把每年的资助增加到88万日元。到1887年，政府又将长崎造船厂低价售与三菱。自此三菱在航运与造船业上，遥遥领先，自然在国际竞争中，亦能够占先矣！

这些公司，凡有特殊成功者，不仅由于政府廉价之售让，又有不同的资助和保护政策的施行，还有特殊当权者的协助。如三井由于和维新元老井上馨的特殊关系，能以在招标三池煤矿时，透过大藏省，得知其它公司之标价而获标。^②三菱得处处受到恩宠，乃

① 日本自此放弃国有政策，走上私有企业之途。

② Mikiso Hane, *Modern Japan, A Historical Survey*, Westview press, 1986. p. 101

因其老板岩崎弥太郎与维新领袖大隈重信有深厚的私交。到了20世纪，财阀集团更与高级官僚结有姻亲，故更能合作无间。从以上所言，大致可以看出维新时期新兴企业的一定模式：往往先由政府设立工厂，训练基本技术人员，输入外国技术，到达某种程度的成功时，即卖出作为私营。而早期日本之私营银行家、实业家，多与维新政府之官僚同出一源，多由旧有之武士阶级转化而成，故他们具有相同的背景、共同的语言和价值观。这批新兴的企业家，自称为实业家，以别于传统的工商阶级。他们是武士银行家、武士实业家，与武士官僚相同。这可谓明治时期新型实业家最大的特色。^①

到了1900年，日本已有440人，其私有财产超过50万日元。这些金融企业界人士，如上所言，多具武士背景，或系武士家人，其精神状态皆与武士相同。他们从事实业之目的，是为国家和社会服务。为了国家的前途，对自身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皆可舍弃不顾。他们看政府为自身的合作伙伴而非敌。他们认为，站在自己岗位上，达到“富国”的目的，与在朝之官员同样是对国家的贡献。他们对于国家除了出钱出力，也常为政府作咨询之工作，在收集商业情报，提供政策性建议方面，皆不遗余力。故到甲午战争结束之时，这些新型企业之代表，如三井八郎右卫门，三菱的族长和涩泽荣一等，皆得以封爵，并被任命为贵族院之议员，以表明企业领袖的社会地位。^②

换言之，到了甲午战争，新兴的企业渐已成型，在组织上大致就绪；在国际市场中，也有了不尝试；与政府的配合和战时的协调，也经过了实际的考验和建立了一定的章程。因而到了该世纪之末，日后财阀集团的雏形，已大致具全。

二 财团之入侵中华与财团的扩张时期

中日订立马关条约之后，基于最惠国条例，日本得到西方帝国主义数十年来在华所获之一切特权。而日本进一步要求开放内陆港口，如苏州、杭州、沙市、重庆等地，规定日本可以在诸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利用中国原料、廉价劳工，推销其产品到中国庞大的市场。其产品不仅成本低廉也无需支付关税。加之缔约国有权在中国的内河航运，中国政府对之完全失却控制。

战后中国又被迫支付大笔赔款，日本不仅用来扩张军备，准备下一步与俄国之决战，部分赔款收入也用来建设轻重工业。其中最著名的重工业是九州八幡制钢中心，其日后也成为私营企业。此外，大笔款项用于支持棉纺织业的扩充，使其产品成为日后日本主要的输出品，足见日本的军事扩张与经济之扩张是互为表里的。

战后日本除了占领朝鲜和台湾，其原有之领土野心还包括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地^③，虽因该地区已有他国利益在先，日本未能尽达其目的，但藉着马关条约所得之特权，中国的若干地区已成为日本的“半殖民地”。换言之，中国的不少地区已成为日

^① W. J. Macphers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1868-1941*, Macmillan, 1988. p. 40

^② Peter Duns, *The Rise of Modern Japan*, Houghton Mifflin, 1976. p. 145

^③ 明治维新后，日本鉴于西方列强皆有广大的殖民地，故贪图中国领土，但自三国干涉还辽和门户开放政策被国际接受后，日本贪图攫取中华之心，仍然有增无已。

本“非正式帝国”的部分。^①日俄战后，日本强行控制了辽东半岛，不久建立了南满铁路和关东军，双管齐下榨取东北的资源。到了1910年，中日间的贸易总额已超过了日本与其直接属地之贸易额，为台湾和朝鲜总和的5倍。

早期日本自中国所要的以棉花、铁砂、大豆、煤等工业原料为主。此外，中国提供日本的还有廉价的劳工和无限的市场，日本运往中国的，初期多以纺织品与海货为主。从1900年开始，中国还成了日本主要的移民地区。故短期内，日本在华人数超过了英国。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华之人数已超过西方各国在华人数之总和。此外，日本在华工厂数字，到20世纪开始之后，也不断增加，并且快速超过了西方国家。日本企业在华发展之政策与西方帝国主义相比较，主要差别有三：第一，日本不用中国的买办阶级，一切自理；第二，日本不用劳工的中间人，直接自己招募劳工；第三，鼓励日本员工学习华语穿着华服，熟悉中国习俗，甚而鼓励与华人通婚，目的皆在易于刺探商业情报。

甲午战后，日本在华的经济发展，主要有三大公司集团^②，并以上海为中心，沟通长江流域和世界各地之贸易。以航运业来讲，开办最早，事实上，早自1875年始，三菱已开通横滨与上海的航线，该世纪70年代后期，也运三池出产的煤到中国。自马关条约获得中国内河航行权后，即刻进入长江。1898年开始，大阪航运会社，也进入长江。三井由于1900年后与中国之贸易大增，自1903年起，也开始了自己的航运业，输送棉花、木材、水泥、米糖、大豆等产品。不久三家航运公司开始发生利益冲突。日俄战后，由于日本航运与法国亚细亚航运公司竞争凶猛，日本政府借此机会于1907年，将大阪航运公司强行归并于三菱的日本邮船会社，以增强日本航运业竞争力。自此日本邮船会社成为在华的一个主要日本企业。

此外是银行业。由于日本在马关条约后所采取的是金本位，而中国一直用的是银本位，双方在贸易中，银行业的服务变得十分重要。日本在1880年成立的横滨正金银行，捷足先登，在甲午战后为日本在华的贸易公司，提供外贸方面的各项服务。该银行与三菱老板岩崎家族有紧密之关系，故常由岩崎家族人员出掌其业务。到了1911年，该银行包办了日本外汇总数之一半，为日本在华银行业的泰斗。

在华一般性的贸易，三井无疑是最强大的财团。维新后不久，三井经一批旧武士的渗入与改组，由银行业、零售百货商转入矿产、棉织业。到1895年后，由于中国市场大开，同时日本政府提出各种棉织品运销中国的优惠条例与鼓励，最先是自1896年开始，取消纺织品的出口税；次年又拨款300万元协助棉织品之外销，此数到1899年，增加到1000万元，作为低息贷款外销棉纺用品，所以加入棉纺外销业的公司为数越来越多。三井物产早在1896年就在上海设立上海纺织公司，但未久倒闭。到了1902年，又将之复业，并与中、英、美、印合资。到了1906年，又买了一家即将破产之纺织厂，仍然与他国合资。三井之目的不在生产棉织品，而在推销棉纱。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华开设的棉织公司增加到42家工厂，占中国棉纱产量之11%和棉布产量之15%，其时，日

^① 近年西方亚洲学专家出了一本文集：*Japanese Informal Empire in China, 1895-1937*, (Edited by P. Dunn, R. Myers & M. Peatti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此书强调在“七七”前，因日本在华之种种不平等条约下之特权，中国虽未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但已是日本“非正式帝国”的一部分。“非正式帝国”算作一种新概念，其实中国早已称之为“半殖民地”，二者无大差别也。

^② William D. Wray "Japan's Big Three Service Enterprises in China, 1896-1936", 在Note7列之书第二章，有详尽之叙述。

本棉布总产量之41%销售给中国市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利用西方国家因大战而腾空的市场，日本政府提出各样的补助与津贴，设法扩充日本在华的各种贸易和企业，日本在华所得之利润因而大增。

此时期中，日本帝国主义透过财团对华的经济侵略，恐以汉冶萍公司的经验最为明显。^①日本用马关条约所得之赔款建立了八幡制钢中心。从1901年开始，八幡所用60%的铁砂原料，来自大冶。此数相当于大冶年产量之60%。到1903年，日本工业银行向大冶铁矿贷款300万元以扩充设备。到了1913年，大冶无力支付所借款项，于是被迫向横滨正金银行贷款。贷款总数是1500万元，其中600万元是用来清理所有旧账，余数则由大冶每年卖给八幡的矿砂作为抵押，此后，矿砂之价格不得更动。因此，大冶铁矿自此多年都在为日本服务，是八幡制钢低价原料之供应者，而横滨银行利润得以保证，同时鄂、赣、湘诸省尚得照顾横滨银行之生意，以促进其在华之业务。

日本在华的贸易是以三井物产种类最广、为数最大，从芝麻、啤酒、化学、玻璃等工业产品到提供电器材料、铁路设备、矿产、军火及造船等重型工业，又为武汉扩建电话系统。自此三井除了贸易，也从事各种轻工业、电器工业和重工业等贸易，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三井所有的信用贷款，几乎完全没有限制，故更增强了其贸易方面和投资方面的灵活性。到这个时期，财阀集团可以说是到达了成熟的阶段。从日本经济发展来看，由于财团财力的充足，财阀集团最适于投资新企业，开发新的外销市场和开创殖民地的企业，因而财阀集团和帝国主义合作无间，二二为一。

三 财阀集团与政党之勾结——加速发展时期

要明白财团如何会与政党相勾结，首先得知道政党产生的背景、明治政府中派别的划分和财团是怎样和政治相联结的。

在皇室复辟之过程中，萨摩、长洲、土佐和肥前四藩武士出力最大，故维新政府最初亦由此四藩武士控制。可是四藩之中萨长二藩，势力特别浩大，财力、军力及人才皆胜过土肥两藩，是故在维新政府中左右了一切大权。土肥二藩的武士因在政府之中失势，于是成了日本近世政党运动的先驱和早期的首领。足见日本政党运动的领导分子与维新运动的领导分子是同属于封建武士一个背景。

在新政府当权派之中萨派和长派很自然成为两派。明治中期之后，跟随文相伊藤的与跟随武相山县的又成了两派。军界中海军与陆军又分别与萨长相分。在政党活动中，自由党系统相传的和进步党系统相传的也有了区分。可是在甲午战争之前，当权派中之政治领袖们与政党活动是不相干的，因政党活动是代表失意的异议分子。日后当权派之所以加入政党活动，得从明治宪法说起。

明治宪法之主要精神是受了德奥宪法传统的影响。^②其特点在于议会的权力是有限度的，这限度是表现在预算的决定上。假若国会不通过内阁所提出之预算时，内阁可以自然的延用上年度已通过之预算到下年度。同时，在明治宪法下，首相的任命不是决定

^① Ibid, pp. 50-51

^② 1882年伊藤博文率领宪法研究小组赴欧考察，大多时间在德奥首都，事后草草访问英伦，因伊藤认为日本国情较近德国。

于议会的多数党领袖，而是独立由天皇任命。故内阁不向议会负责，而是向天皇负责。^①所以只要议会通过一次预算之后，内阁几乎可以对议会全不理睬。甲午战后，由于日本获取庞大的赔款，自1896年开始，预算年年上升，旧年的预算完全不敷应用。这种情形使其时当权派中各派系之领导，即维新元老们不得不相继投入政党活动以控制政党，进而才能控制议会。到了20世纪，维新领袖的人数日减，政党的地位也就相对的提高。

财团与政党的勾结，首先是因政党活动皆需钱财的支持，自1900年伊藤博文改组政友会之后极需财源支持，由于伊藤与井上私交甚笃，而井上与三井财团关系密切，自然三井就成了政友会的财源所在。到了1905年，西园寺公望继伊藤成为政友会之党魁，多以元老自居，党务则交与原敬统理。在原敬作为党魁后，财团才全面卷入政党活动。

原敬是平民出身，当过新闻记者，做过日本大报社的社长，又是银行家、公司总裁，在正式从政之前也做过大使，实足代表受过新教育，受过西方思想影响，有国际经验的自由派人物。可是其政治哲学并没有继承自由派传统。当伊藤接掌政友会之后，原敬协助他改组政友会，在西园寺继任党魁之后，原敬一直负责日常党务。西园寺正式退居元老地位后，原敬由政友会党魁的地位，正式当选为日本第一个由平民出任之首相。

战后日本政局的演变重点之一，在于选举权之扩张，同时政党的地位也日渐升高，是故议会的选举变得十分重要。^②捐款的多少对政党的成败成了极重要的决定因素。自此，政党与财团的合作更密。如日本银行之总裁高桥是清，被原敬邀请而加入了政友会，日后也成为党魁，并出任首相。此外，财经界的巨头如加藤高明、浜口雄幸，若槻礼次郎等，都加入了政党活动，成为20年代政界要人。原敬内阁除了外交和海陆军外，阁员皆由实业界人士或与财团有密切关系的人员充任。故原敬内阁也有“富人内阁”之称。

战后日本财阀集团与政党关系不断加深，到了1930年，每8个下议院议员中就有1个是来自财阀集团；每4个贵族院的议员，就有1个是代表财阀利益的。

在同时期内，所不可忽视的是财阀集团与官僚集团的姻亲关系。如三菱老板岩崎文弥的一个妹妹嫁给三任外交部长的币原喜重郎；另一个妹妹嫁给曾出任首相的加藤高明；第三个妹妹嫁给内务大臣。而住友财团的总裁就是西园寺的弟弟。从这些关系，足以看出财阀与政界之密不可分。大战之后，日本政府政策之制订，是由四大政治集团即政党集团、官僚集团、财阀集团和军方来决定。事实上财团的影响渗入其三。所以1927—1929年的政友会内阁，被称为三井内阁；1929—1931年浜口改组的内阁，有三菱内阁之称。财团势力扩张到什么程度，可见一斑。由于财阀与政党及政府官僚有如此紧密的关系，可见政府何以无意去阻止财阀集团的发展，对于劳工福利，甚少顾及，对于反托拉斯的立法和防止兼并中小型公司的法律，亦无甚兴趣。而财阀集团可以控制贷款、原料供应及销售运输等系统，来打击同行对手，吞并弱小公司。^③到了20年代，近世日本的四大财团正式出现，七大银行及十七大财团等，亦皆确立。

财团所以在这个时期能有如此的进展，可说是奠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几年间。由于西方各国深深卷入战祸，西方国家在亚洲所有的市场，顿然成为真空，日本政府用尽

^① 日本内阁从1885年开始，第一届议会选举是在1889年宪法颁布后之次年。故内阁先议会存在，也与议会选举无关，故有“超然内阁”之称。

^② 日本宪法成立之初，只有1%的人民有选举权。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选举权扩大，选民大增，又实行“宪政常道”，故选举之重要性大增，政党之开支亦大为增加。

^③ Hane, *Modern Japan*, p. 209

各种方法鼓励资助各种公司扩充发展。这时期成了日本工业生产、贸易和航运业的黄金时代。战争期间短短数年，造船业发展最为惊人，增加了9倍之多。

在工业发展情况下，日本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使劳动成本上涨。而战后中国亦属于战胜国之一，其民族主义大盛，加之北伐后有国民政府之建立，关税不仅加价，且要求自主。日本的实业界一面为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工，一面为了躲避中国之关税，大量向中国直接投资。所以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工厂在长江各口岸处处林立。上海和青岛两处的棉纺织业尤为显眼。最受打击的中国工业是棉纺织业。中国棉纺工厂与日本的比较有许多的弱点，如设备老旧，原料供给不足，管理太差，杂税太多以及信息不灵。而日本的各公司，除以上方面有明显优势外，还有政府代为交涉，军队从旁保护等超经济的优越条件。因此日本财团在中国势力之扩充是不难想象的。

四 财阀集团与军方之合作

财阀与军方建立关系，当是在日俄战争结束而日本确立了在辽东势力之后。1906年，日本筹设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开始修建南满铁路，同时在辽东和南满铁路地区驻军。1919年正式组建关东军负责东北军政事务。关东军由日本军部掌握，是日本维新后第二代新兴军人势力的代表。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势力所及不仅限于铁路修建及运输，亦包括沿路的租界地，出境的港口，是一个包括多面性的企业公司，如一个政府。^① 满铁总裁是由日本内阁任命，故总裁也直接向内阁负责。到了30年代，满铁雇用人员高达25万。其研究部门特别庞大，为关东军占领东北拟订计划，同时对整个中国的国力，也作了彻底之研究，替日本军政府估计中国对日本的战力究有多少。到“九一八”前夕，日本在东北的投资达8.5亿美金。满铁本身虽属官方公司，事实上是由19家日本投资公司联合组成，其中大者如横滨正金银行、三井物产会社，足见满铁亦受财阀集团操纵。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接着苏联在中国之影响日巨，共产势力日渐扩张。北伐之后，取消不平等条约之呼声四起。特别在济南事件之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此起彼伏，如罢工、游行、抵制日货等群众运动，处处皆是。加上日本浪人和军人在中国各地的肆意妄为更激起中国各界的反日声浪。日本关东军中之少壮军人，尤恐在不平等条约下之现行制度从根发生动摇，故尽力设法将东北从中国划分出去，使之不受中国形势影响。然而中日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越来越深。^②

战后的日本，从表面来看，是在推行宪政，扩大民权，即实施日本学者自称为可骄傲的“宪政常道”。而事实上，在这一时期，日本的超民族主义的军国主义思想正在暗中蔓延。各种极右派的组织在一般社会与军人中，加速发展。自从裕仁继任天皇之后，军国主义的运动随着世局的变迁和日本经济的衰退，相对的更为蓬勃。^③ 一时极为兴盛的右

^① 有关南满铁路之资料，近年发布中文文件甚多。Ramon H. Myers, "Japanese Imperialism In Manchuria, The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Company, 1906-1933", 在 Note7 所列之书中，是一综合之叙述。

^② Donald Jordan, *Chinese Boycotts Versus Japanese Bomb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1. 此书是修正主义派著作之代表，认为第二次中日战争是中国向日本在华利益挑衅之结果，但书中披露了20年代日本浪人，军警，甚而和尚在中国横行霸道的劣迹。

^③ 宋永德《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展背景的剖析与思考》是对该题总括之讨论，参见《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1期，第13-25页。

派极端爱国主义社团的发展尤不可一世，当时最有名的组织如国本社是以效忠天皇和帝国为中心，其中不仅有高官政客，亦有知名将领，同时财团代表也不乏其人。

日本军方为解救国家“前途”，对内是夺取政权，对外是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目的在开发东北的资源以供帝国之需。故在1934年宣布了伪满发展大纲，说明种种基本设施的建设和各种工业发展的原则与计划。到了“七七”之后，由于日本对煤、铁、电等需求的增加，伪满成立了“满洲国”重工业发展公司，由伪满和日产会社双方各出一半资本，故日产成了新兴的财团。

日本从“九一八”到“七七”，短短6年中，军费增加了几近3倍。是而日本较其他一般西方国家提早脱离了经济恐慌的困境。到1935年，日本首次成为出超国，其棉织品的出口超过了生丝。到1936年，日本成了最大的棉制品外销国。同时期，其金属机械总产量也大大提高。中日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在中国东北重工业的发展也随之加速，煤、铁、轻金属、汽车和飞机制造以及化学等有关军事工业齐头发展。在“七七”之前，东北的工业之50%以上与大豆有关，到了1940年，31%为金属工业，15%为化学工业，此外东北之金融业，全为日本公司所据有。

关东军为控制东北，在经济上首先尽量扶殖新兴的财团，军事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等皆承包给一些新成立之公司，不久这些公司皆发展成了新兴的财阀集团，如日产公司是当时新成立不久的公司。除了日产之外，如日本塞斯、本田等都是新起之财团。可是事实上日产到东北开始经营的总裁相川之所以被邀到东北，乃是因他的筹款能力闻名一时，而相川之能筹款是他与三菱有近亲关系。上面所提之塞斯亦与三菱有关连。至于丰田，又与三井有关。^①此外，如从事化工业与电器业之森格，又与安田集团有姻亲关系，所以从始至终，整个东北工商业发展，未能逃脱财阀集团的法网。东北新兴的公司只是日本财阀集团的“子公司”罢了。

战争期间，每当日军占领一地，其中若有矿场与工厂，军方即交财团处理。如1938年日军占领上海后，日本海军即将江南造船厂和上海机器工厂交给三菱重工业公司接管。^②无怪日本的四大财阀在1941—1945年间所控制的企业足足增加一倍。到战争结束时，三井和三菱所控制的海外资产超过了日本海外资产之一半。同时，战争期间日本动员员财阀在工业、贸易和金融各方面处理新建帝国的一切需要。

1943年，东条内阁组织了由七大财团代表所合成的顾问委员会，来筹划生产战时军火之需，并特别成立了军需省，自兼首长，而实际业务则由内阁另设之政务委员处理。此无定职之“不管部部长”是三井集团之首脑人物藤原银次郎。由此观之，二次大战期间，主管战时计划与统筹战时生产的大权仍操在财阀手中，当帝国扩大时，他们所控的资本亦随之扩充。欧洲战场战争结束后，盟军在亚洲大举反攻，对日本海外及本土的工业愈炸愈猛，对日本工厂企业之破坏也愈来愈凶。财阀为了保存自身的实力，将所有工业完全国有化，一切工厂生产机构全由国家接收。工业国有化以国库为保证，工厂一切维修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并给所有私家分司一定的利润。但工厂经管权仍操在财团手中，战争结束后一切归还原主。简言之，一切工业，仍在财阀控制之下，一切损失，全由国家

^① W. G. Beaseley, *The Rise of Modern Japan*, st. Martin Press, 1990, p. 189

^② Eleanor Hadley, "The Zaibatsu and the War", *The Japan Reader* (Edited by J. Livingston, J. Moore and F. Oldfather), Pantheon Books 1973, p. 452

负责。但资产的所有权最终仍属财团，并有法律保障。足见此时财团与帝国的命运二二为一，财团是日本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45年盟军占领日本之后，在清理战犯过程中，财阀集团与军国主义集团被视为一体。占领政策是将财团一律解散，其领导人员受战犯之审理，公司股票出售。同时战后日本政府经过立法，废止连锁董事制，废止财力集中及托拉斯等。被解体之企业达1200家，三井、三菱被分散成240个公司。

可是战后不久，由于冷战的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兴起，加之1947年吉田任首相后，日本政客玩弄美国之高超技术^①，到1948年新的审查委员会成立，最后仅11家公司被解散。到1949年日本一再修改反托拉斯法，并建立通产省，使得日本政府能全面地与各大财团合作。由于美国已决定重建日本，韩战爆发后，在日本不论是政治或经济战犯，全部释放。1952年，日本恢复独立，原有全部财团，加速合并。到1953年，影响财团发展的法律阻碍全部取消。战后日本财团，虽然外表有了变化，但其财力集中的本质，与政府密切合作的关系，及其进袭国外市场的策略等，与战前并无二致。

五 结 论

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论是在旧武士当权时期，是政党握政时期，或是日本军国时期，财阀集团处处受到日本政府的协助支持。同样，财阀集团成员本身与当权者是同出一个社会背景，多有重要的姻亲关系，同为扩张国家而努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财团一直控制着日本的财经系统和财经政策。故财团的利益与日本的兴盛，互相依靠，互为表里。日本的这一传统，到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除了一个短时的间断，今日重新恢复。今日的日本财团，虽也增加了不少新的名称^②，每个财团可能已不是某一个家族所私有，然而其经营方式和策略，并未更改。所不同的是它有了更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经营手段，与政府有着更具效果的合作，因而更具威力，势更难挡。

中国在这种新的日本财阀集团之威势下，如何能发展一种公平互惠的生产合作和经贸关系，面临一种大的挑战和考验。同时，从甲午战争以来将近一世纪之中，日本对中国的巨大掠夺，造成中日间之工业经济今日如此之悬殊，使我们在重温日本财阀兴盛过程时，也不得不问：日本今后应该怎样补偿中国近世因日本侵略而受到的损害？

^① 战后日本为袒护战犯，对美国最常用的策略，是将其袒护目的与反对社会主义的原则或防止国际共产之扩张相连接。事实上，日本用这种借口达到任何目的皆甚有效。吉田茂内阁尤通此道。

^② 战后日本新兴企业财团如丰田汽车、富士制钢、东芝、松下、日立电器等皆然。